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二〇）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八八期 ——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102d)

---

【当事者说】	岁月流沙（下）	• 蒯大富口述 • 米鹤都采编
【往事追忆】	我在清华大学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王大定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当事者说】

岁月流沙（下）

• 蒯大富口述 • 米鹤都采编 •

（续上期）

◇ “7·27”事件

7月27日那天早上，没有任何与往日不同的征兆。我们总部的一个委员陈继芳回沈阳探亲，说那天要回来。我和同学开了个吉普车到北京站接她，但是没接到，就回来了。回到清华大学快十一点了，就看见学校周围那么多人，车子也开不动了，我们就下车徒步走进清华。开始，清华井冈山广播台的广播还是热烈欢迎首都工人阶级来清华制止武斗，后来就不一样了。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后，很快就把各楼分割包围了。那时我们团派和四一四的武斗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了，我们在科学馆把四一四包围得像铁桶似的。工人到了之后就把科学馆的包围圈打开了，把里面不到一百人都放出来了。好多同学都着急了，脑子就跟我想法一样，怎么回事啊？

后来呢，我就跑到总部那个楼里头去看。路上，我看到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他们还打着造反组织的旗子，和我们是一派的。这些“天派”的组织，我以前跟他们打过交道，当时跟他们一起组织筹建北京市革委会的。当时有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他也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他是带队的。我看到他，认为不会有什么事，根本没想到可能会和工人打起来。但是，

当时工人来那么多啊，我当时估计有十万人呢，后来毛泽东告诉我有三万多。参加的有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厂，主要是工人。还有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八三四一部队，是负责组织和指挥的。当时八三四一部队的负责人是杨德中、张耀祠，在现场指挥的是张荣温、迟群、谢静宜。

结果发现，工人逐渐把我们包围起来了，非常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割包围，这很恐怖啊。后来我们有同学就出去理论，一个同学对工人讲：你们工人不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跑到我们学校干吗？还把我们包围起来。工人和你有什么可讲的，不由分说，把他一架往卡车上一扔，就鸣的开走了。出去一个逮一个，出去一个逮一个，当时我们看了感觉非常恐怖。当时抓了至少有十几个吧，我看见把我们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康抓走了，还看见我们另一个总部委员高季宏也被抓走了。他们都是出去讲理时给抓的。后来听说，工人们执行的命令是这样的，进校把所有的学生包围起来，如果有学生和他们辩论，就几个人一架往车上一扔，拉到平谷县办学习班去了。当时感到不可理解，你这么包围干吗嘛？

我们当时就打电话问市革委会，工宣队来清华大学到底是不是中央派的？所有各方面都不给正面回答，就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下次再报告时，又说这两天休息开会干嘛的，反正不答复你吧。我们也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电话，他们的答复就说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情况，首长正在工作，正在开会，我们会把情况向他们汇报。江青等领导人的电话我们没有。其它这些电话我们都打过，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我们被包围后，看到抓人、打人就很害怕。我当时真是感觉这是灭顶之灾啊！以为北京市的工人宣传队会像王洪文在上海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那样做，当时活活炸死二十来个人呢。那么，结局就是，“上柴联司”（9）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了。但这时我们手里还有武器，怎么能让人家轻松消灭掉呢，那不可能嘛。

我们商量了一下，后来一致意见就是守住楼，如果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后来，下午三点的时候吧，我们有个常委，武斗的副总指挥。他就带人冲出去，反过来把工人包围起来，工人如果不走，他就往楼里拖。反过来我们也抓了好多工人和解放军。那些工人看你这么抓人，他也害怕，工人就散了。一散了我就出去了，当时正门出不去了，是从西南门翻墙出去的。当时我们学校的小车都在北京体院，我就跑到体院要了一辆车，就直奔市革委会去了。我到了市革委会，强烈要求见谢富治、吴德。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吴德来了，见面就说，你们学校打死人了。我离开的时候，两边还基本上没开打呢，但是走了以后这段时间说打死人了。我一听打死人就发毛了。我冲着吴德喊：是谁派的工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学校包围起来，就这样抓人？他说工人宣传制止武斗有什么错？我说，你们真要把我们当“上柴联司”抓的话，我们肯定就宁死一拼。吴德说，你这样就把北京几百万工人阶级得罪了，你蒯大富在北京没有立足之地！

后来他把我带进办公室，他打电话找那个工宣队的指挥。那时开始派出去的不叫工宣队，叫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以解放军为核心。他后来就把八三四一部队的迟群、谢静宜都找到北京市革委会，在会议室开始谈判。他们说制止武斗，撤出工事，什么什么的，我全接受了。后来迟群提出来交出杀人凶手，我说什么杀人凶手？他说你们打死我们人了。我说怎么打死的，谁打死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条我接受不了。

这样，我们就一起回清华了。迟群又生枝节，说工人怎么气炸了，非要交出杀人凶手。回到清华后，他又要谈判。清华园门口有个中学，叫清华园中学。当时就找个教室，谈判就在那儿举行。谈判就为了交不交凶手的问题。我说，凶手肯定没法交，我说今天制止武斗、交出武器、撤出工事，这肯定没有问题，我说我到现场就肯定能解决。后来迟群不坚持了，我们就达

成协议。工人宣传队还有几个地方没有攻进去，如清华广播台、化学馆等地方，我就到我们还占据的地方去做工作。

当时的武斗现场就是互相抓人。工人在外面把我们的人抓了，我们把他们的人抓进里头，然后工人冲进楼里救他们的人。工人来清华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就带几把镐、锹什么的，准备拆工事来的，还有女的穿裙子呢，不像是为了打仗来的。但是后来看气氛不对，好多同学被抓了之后，大家就毛了，当时决定的策略就是谁进来就打谁，进楼我们就坚决抵抗。因为工人是进攻，而且大多空手来的，所以他们肯定吃亏，伤亡多。

后来我到广播台去，好多头头都在那。我召集会议说，我们闯了天大的祸，工人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十万工人已经把我们清华围得像铁桶似的，出不去了。明天我们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会有更多的工人把清华包围起来。我说我们今天晚上把武器全部埋起来，或者扔了，然后人呢，全部撤空。清华我们不要了，跑到外面去，跑到大街上去。当时吵得一锅粥，有的不同意，说拼了，一拼到底。后来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全打死了，你占楼还有什么用？我说赶快跑，跑出去以后，这么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活着，中央知道了就肯定会救我们的。

后来大家就听从了我的意见。这时候工人在正门、南门、西门都有包围，就北边没有人把守。我们半夜像逃难一样，夜里一、两点都从北边、体院那边撤光了。当时清华参加武斗的有一千人吧，加上逍遥派，总共一两千人都跑掉了。我也跑掉了。

#### ◇ 见了毛泽东格外亲

我从清华再次跑出来，还是先到体院。到体院我要了一辆车，直奔六部口的电报大楼。和我在一起的有陈育延，是个高干子弟，也是我们总部委员；还有一个是段永基，当时是我秘书。我们到了电报大楼，给中央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内容是：“毛主席，今天早晨，‘杨余傅’黑手派了十万工人包围洗劫清华园！清华井冈山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向党中央呼救！”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我们花了五十块钱，当时给不同的人，发了好多份。发完电报就四、五点了，转了一圈，也没地方去。我说还是去北航吧。刚到北航，他们的保卫组长告诉我：老蒯，你还不回去啊？我说，什么？他说，韩爱晶早去了，中央找你们呢，走大会堂西门。噢，我到处找中央啊，中央也正在找我呢！

听说在大会堂西门，我当时还想了一下，平常去大会堂接见从来不走西门，一般接见我们都是进东门、南门，北门是宴会厅的地方，西门没有走过。听说在人民大会堂西门，感觉有点特殊，但也不及细想。我就赶快请司机开车，到人民大会堂天已经快亮了。我跑出来时，还要了一把手枪带在身上。这时我把手枪拿出来，放在汽车座的底下。后来我就走上台阶，有两个卫兵已经出来，问，你是谁？我说，我是蒯大富。他们问，干什么？我说，中央首长找接见。他说，你等会儿，我进去通报一下。他就问我带武器没有？我说没有。夏天嘛，就穿一件衣服，而且下雨，裤脚都卷起来，光着脚丫子，穿个塑料鞋，非常狼狈。一会儿，谢富治出来了。我看见谢富治就哭了，当时就像孩子在外面被打得落花流水以后，看见父亲那么一种心情。谢富治说，别哭别哭，跟我走，跟我走。他给我把裤脚放下来。后来我就跟着走，一边走一边抽泣，直流眼泪。

我们走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后来知道这是湖南厅，门很宽。进门我一看，一屋子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白衬衫，白花花的一片。进门后，韩爱晶就在右手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我这时就看见主席了，平常接见老远打个招呼，再就是见面握握手，没有其它的。这一次是空前绝后。毛泽东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就是那种男人发

自肺腑的哭声！毛泽东也哭了，哗哗直流眼泪啊，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我说了一句：主席救我！就说不出来话了。江青就说：蒯大富，安静点，安静点，别激动。服务员拿来一个痰盂，一把铅笔，还有什么笔记本，还有一沓纸。江青说，你说说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开始汇报情况了，那真正是告御状了。我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进了各楼分割包围，把我们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好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是不带枪、不开枪、不打人、不骂人、不动气，“五不”嘛，这我都记得。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一包围就抓人，就打人。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我说鲍长康就被抓走了。毛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康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康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怎么受伤。

那个会从凌晨三点开始的，我去的时候很晚了，大概七点差不多。会一直开到八点半结束，共五个半小时，你想谈了多少话啊。后来，他们已经是在聊天了。我听谢富治讲，毛泽东开始发了很大的火。但他只说主席今天发了大火呀，不过这火是会议开始时对中央领导讲话时发的，冲谁发的我不知道。聂元梓、韩爱晶他们到的时候，主席已经不发火了。当时中央领导人除了张春桥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汪东兴，中央的全体领导人都在。前头已经谈了四个小时，没散会，实际上主席有想等我的意思。主席并且两次发问，蒯大富为何还没来？

我来以后呢，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我，主席说你们是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说武斗不能再搞了。主席完了又说，打工人无论如何是臭了，你回去要挨门逐户向工人阶级赔礼道歉。工人气很大，你们要给工人消气。不过他也说道：“我把你们找来是护着你们的”。看来，毛泽东当时心情也很矛盾，他本来只想把我们赶从舞台中央赶到旁边去，但是没想到以这么惨烈的方式实现。因为当时我们是跟着他走的，忠心耿耿跟他走的，而且一步一步地去理解他的部署。

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返回来了，他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没有毛泽东死保啊，我当时可能就完了。

#### ◇ 没想明白的疑惑

后来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共同整理了一个传达要点，根据谢富治要求把一些称赞我们的话删掉，包括批评四一四的话，然后五个人签字作为文件传达全国。韩爱晶后来整理出一个文件，比较全面真实。

我当时还没想通呢，怎么我们就都错了？你们外面来了那么多人，也不通知一声就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为什么？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1968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中央，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把我们赶下台，派工人宣传队肯定是他同意的，但没想到这么激化，牺牲这么大。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行动是八三四一部队指挥的，但工宣队是北京市派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分析当时他们为什么封锁消息、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来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这样做的目的和实际结果，可能是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自己当时还问呢，怎么不打招呼啊？还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个从毛泽东当时的表现，我看不出毛泽东有这个阴谋。

在我没到会之前，很奇怪的是，毛主席问了几次，蒯大富为什么不来啊？韩爱晶的会议记录里记载，谢富治两次回答说，蒯大富他不敢来，或者说他不肯来。毛泽东又问，蒯大富为什么不肯来啊？韩爱晶回答：蒯大富不会不肯来的，他要知道一定会来见主席。谢富治在那个会上还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什么，我就感觉他们对我们那么狠，等于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一打以后，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会基础。我感觉是有人搞鬼，包括迟群他们和吴德他们。

7·28会后，我就到各个工厂挨门逐户地去赔礼道歉，还包括善后处理。事后统计，工人死了5个，有枪打死的，有手榴弹炸死的，有长矛捅死的，一共死了五个，伤了七百多。死了的工人作为烈士处理，善后还包括各个工厂被打伤的、住院的工人。后面的事情我没有参加。学生死了2个，伤了一百多。所有打死工人的学生全都找到并抓起来了，没有判死刑，大都判了十五年。

后来在判我罪的时候，一个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一个是诬陷罪，还有一个杀人罪。但是当时要是主要以武斗判我罪的话，我还比较服气。因为事实确实如此，我对这场武斗负有主要责任，我非常后悔，这也是无可奈何，在劫难逃。

毛泽东那次讲话以后，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宣告了学生运动、红卫兵运动完全结束了。学生也散了，年底分配，能走的都走了。我回到学校，办了一段时间学习班，1968年年底分配我去了宁夏。

#### ◇ 查无实据整肃“五一六”

1970年，准备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是当选为北京市选区的人大代表。1970年10月底，上面通知我参加北京市的人大会议。北京提名我当四届人大代表时，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对，后来毛主席发话，谢富治做工作才通过。王力告诉我，说中央给我保留了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子。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厂都以为我去开四届人大的。宁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飞机去的，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机场后，北京市革委会派车接我，并在市革委会吃的晚饭。饭后，清华就来人了，说找我有事，把我接到清华去了。我到了清华大学工字厅，在党委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迟群、谢静宜、刘冰等，大概五六个常委都在等着我。

迟群开门见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代，清华党委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说，组织上对我审查，我完全服从，我保证积极配合，但是我严正声明，我没有隐瞒任何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代，所有问题我都已经在办学习班的时候全部交代清楚了。

后来我才知道，抓我是因为所谓的“五一六”问题。其实，真正有组织的“五一六”，就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他们搞了个小组织，取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根据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得名，大约有几十个人。他们在1967年5月开始攻

击周恩来。同年9月，毛泽东批示：“五一六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真正的五一六随即就垮台了。此后，1970年初，全国又一次大规模地清查“五一六”，这时一些人在“逼供信”之下，揭发了我。

文革时，各大专院校红卫兵都在揪这个揪那个，有搞康生的、搞陈伯达的、搞总理的，搞……的各种专案组。那时，我确实反过康生。毛泽东把我们从小盒子里放出来造反，他是要把我们放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或者说他让你反谁，你反就可以。而我们一造反，却就没止境了。我们当时怀疑的范围非常大，只要我怀疑你反毛泽东，我们就敢反你。大约是1967年1月的时候，我们反康生是非常公开的，是以清华井冈山总部名义起草了一个公告，叫做“调查康生同志问题联络委员会公报”，由中央高级党校，还有体院、矿院，我们四家联合发表的调查康生问题的报告。后来，陈伯达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们臭骂了一通，说你们跟我们不打招呼，这么胡搞，你们会把自己搞垮台的。我们吓得够呛，检查也不知做了多少次，不过最后对我们没再追究。

1967年9月，有人反陈伯达的时候，我们当时也准备参与。吸取了反康生事件的教训，然后我们就请示江青。我给江青秘书打电话说，我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向江青同志汇报。江青知道我们要反陈伯达后一顿臭骂，说我们胡思乱想。后来我们就没有跳出来，如果当时反了，可能会搞得很厉害，因为我们搜集了好多陈伯达的材料。当时，鉴于这些事，我下了一条死命令，凡是在中央工作的这几个人，对谁都不能搞材料。谁要违反纪律搞材料被揪出来，我第一个站上台把你们抓起来。当时主要是害怕出问题，后来清华就真没人敢搞。所以我和五一六根本不沾边。

清查“五一六”那段时间，一直把我关在清华工字厅第一个院子靠北边的房子，现在大概是校办的房子。他们没有打人，只是不断施加精神压力。揭发我的都是我们井冈山总部的几个委员，揭发的内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给他们发了表，发展他们参加了五一六；还有就是说我们干的所有坏事都是我指挥的。当时，迟群到我这儿来核对，说揭发我的这些人都是我发展成五一六的。我说：你肯定搞错了。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没发展过五一六。而且据我所知，清华也没有五一六。他们也没搞对质，那几个揭发我是五一六的人，实际没人敢跟我对质，因为确实没有的事。怎么对质？

我当时心里有那么一种倚仗。我对迟群说：文化革命初期，王光美、刘少奇打我反革命的时候，我是清华一个普通学生，申诉无门。当时谁也不知道我，他们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没有办法。现在，你迟群想把我蒯大富打成五一六，你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敢往上报。我不是那个时候的蒯大富了，你不拿出证据来让毛主席、周总理相信，行吗？但你拿不出来！

后来，迟群他们下了很大决心，施加了多大压力，我最后也没有违心承认，也没有乱说去揭发别人。迟群气得说：“难道那么些人做梦都做到一起去了？”他意思是说，揭发我的这些人交代的口径都一致。当时迟群对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劲对他拍桌子。我说，你还拍什么桌子，你们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说八道。

从那时候起，中央文革和我再没有任何联系，甚至都没带过话。包括迟群，谢静宜都没有说过什么。但是你说这事江青能知道吗，包括主席能知道吗？当时我呼救啊，写信啊，写了很多信，没有反应，迟群他们还是为所欲为。

迟群当时很想在清华搞出一个很大的五一六集团来表功，也算报“7·27”的一箭之仇，但最后他落空了。“九一三”事件以后，迟群跟我说：有些事他不能说，实际上有些是搞逼供信

搞的，就算了，过几天就放你回去。1971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没放，一直拖到1973年才让我去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改造。

当时，抓“五一六”搞得那么大声势，涉及到全国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应该涉及有上千万人。清华也抓了好几百呢，事后证明完全是假的，清华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整五一六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背景，也没看到太多证据，但是我自己感觉上应该是周恩来，因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来嘛。那会儿他就是要打掉一拨人，搞了那么大的运动，把造反派就整个打下去了。（10）

全国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苏，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给扫荡了。据说逼死搞死了一万多人，反响太大。江苏后来有个寡妇上告团，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来告。江苏主要是整得太狠了，所以最后中央有专门一个文件给江苏的五一六平反。但是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像江苏那样平反，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没给个什么说法。那一次，基本上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头头，包括天派、地派在内一股脑儿，都在五一六这个名义下审查挨整，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后来看，文化革命中抓五一六，实际上就是清算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以我为例，我分配后去了青铜峡，1970年就把我当五一六抓回来了，然后从1970年审查直到1978年。在清华三年，在东炼五年，这八年期间，林彪垮了，江青垮了，负责审查我们的人都走了，我这五一六问题案子还没完。邓小平上台以后，说文化大革命这笔账还要算，这一算就把我算到反革命那边去了。这就不就是单位审查了，而把我抓到监狱去了。

#### ◇ 林彪江青及其他

林彪事件时，我正被关起来审查五一六的事。开始审查我的时候，还有关于我们反林彪的什么罪，后来有一段就不问了。大概1971年10月27号，迟群、谢静宜一起来见我，他们才告诉我，林彪死了，是反革命。对林彪事件本身，我感到十分震惊。文革当中，我们认为有两个人是最忠于毛泽东的，一个是江青，一个就是林彪。那时对林彪的信任还是不可动摇的，很崇拜的。这对我震动很大，如果说林彪都反毛主席，我感到没什么可信的了，好像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不过这时候我被关起来很封闭，另外思想也很封闭。所以还没有能够从文革的大思路等角度深入考虑问题。

我和林彪接触很少，对他没很深的印象。我记得1967年7·20事件以后，北京召开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回京嘛，林彪出席了那个大会。那次我和林彪近距离接触过一次，在天安门中间的休息室，林彪坐在沙发上，我们一圈人围着他。林彪就一句一句地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可惜没有找到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可以抓住大做文章。这个讲话我都记下来了。这很容易理解，就是抓住7·20的事情，抓住军内一小撮反毛主席的事件，大做文章呗。我回学校就传达了，当时别的学校也都提出反对军内一小撮。我就提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要解决军队的问题。后来周恩来跟着就接见我们，告诉我们不要搞串联，不能参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后来我就不弄了。

文革发生的一系列冲击军队的问题，其实也是起源于五一六通知，那时已经提出党内、政府和军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1967年《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也提到打倒军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力曾跟我谈过，说毛泽东受武汉7·20事件刺激很大，感到很绝望，好像军队已经乱了，对军队也缺乏信任感了。在此之后，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一路上走到哪就讲到哪，对各地军政首长不断发表讲话。然后，这些讲话再被传到北京。中央文革这些在北京的人，看到毛泽东的讲话都感到很吃惊，觉得非常之激烈。讲什么要武装左派

啊，打倒右派啊等等。因此，中央文革这些人在传达毛泽东讲话时，就绞尽脑汁想办法把毛泽东的话说得不那么激烈，把讲话的棱角磨掉。江青当时讲什么文攻武卫，本质上都是毛泽东那段时间的想法，她说的那些话完全在毛泽东这些讲话的范围之内，所以江青后来不服呢。

我以前讲过一些对江青的看法，网上反对意见不少。我一点也不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江青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她舍弃上海那个环境去投奔延安，肯定是奔自由民主去的，奔革命去的。她不可能是投机的，因为共产党当时处在最低潮的时候，就剩了两三万人，穷得缺吃少穿，没有弹药。如果不是张学良、杨虎城的话，那共产党很可能就被剿没了，至少七零八落了。那时候你说到那地方去投机？那肯定是追求理想、向往光明嘛，至少以为共产党是光明的。另外，江青在延安坚持13年，一直跟在毛主席身边，很了不起，她这个行动就表明她真正在追求革命。当时有日本人问我，我说：江青在当时的女同胞中，她的马列水平，她的演说能力，文字能力，指挥能力，都是全国一流的。文革当中甚至可以说是那些人中最好的。江青吃透了毛泽东的理论，毛泽东当然也欣赏她。有一种说法，到最后毛泽东想把江山传给江青，不想传给华国锋，我感觉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最信任的人里头还属江青。

江青在文革当中的问题是她个人性格造成的，她政治上没什么太出圈的东西，执行的基本上都是毛泽东的那些东西。江青自己个人发挥方面有些什么也有可能，但是没有太大的出入，没有什么太多偏离毛泽东的。所以，四人帮的错误基本上就等于是毛泽东的错误，当然不可能说完完全全符合，不过可以说基本上是毛泽东的思想。当然，江青在被审判过程中，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表现。

对中央文革其他几个人，就我的接触，我对张春桥印象还是很好的。张春桥当时跟我讲反刘少奇的时候，把我们当成特别信任的御林军看待。我当时特别高兴，等于说中央这么重要的部署，也是主席的决心嘛，让我们来领头落实部署，那是莫大的荣耀。文革后揭发张春桥，也是由于我的私心。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来人，给我讲得很大了，说你揭发嘛，你立功表现好就可以放你回去。我当时在秦城监狱，那个检察长简直是在说，表现好马上就可以回去了那种感觉。我当时立功心切，把揭发材料写完，然后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来导演，让我反复背，背得一个字不差，以及什么时候做什么手势，都给排演了多少次。后来审判张春桥时我上去揭发。

张春桥绝对是个“人物”，他当时听了我的揭发之后，什么表情也没有，眼睛都没抬。我感觉他上来一句话不说，等于说你们很可笑。一个是我认为你们没资格审判我；一个是我蔑视你，不需要和你们说话，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件事的事实也确实是怎么回事，我说的也毫无捏造夸张之处，揭发张春桥也可能给我免了点罪责。但是，后来我很懊悔，这事其实大家都知道，用不着去揭发，尤其不必要由我去当面揭发。我觉得很对不起张春桥。他那时对我非常信任，现在让我作为一个敌人和对手去揭发人家，来讨好当局洗刷自己，这种行为很低级的，好像小丑一样，显示你蒯大富很卑鄙。我对这个心里很懊悔。

文革中，总理是比较复杂的。我还是非常佩服周恩来，他一直给我的感觉是宏大的气度。他在文化革命中，拼命想追随毛泽东，不管理的，不理解的，他一直在按毛泽东的想法来执行，维护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假如错了，或者不理解，他经常会想办法缓解毛泽东指示带来的后果。我们当时都能直接感受到这些。

我们后来私下议论这个，认为总理是一心跟主席的，最不可能反主席的。我说总理就是老保一些老干部，如果总理不想保谁了，那这个人肯定完蛋了。后来对彭德怀，他就保不住了，因为毛泽东的态度太坚决了，太明显了。他就不可能保了。那段时间清华也斗过彭德怀，几十个单位轮流斗，几乎天天斗。



文革当中，谢富治是一个非常正派严谨的共产党员。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紧跟毛泽东，他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毛泽东、总理、江青怎么指示，毛泽东怎么指示，他都坚决执行，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哪怕不理解的也坚决执行。他很忠诚，从战士一直干到副总理，而且特别廉洁，文化革命中，他工资的大部分都交党费了。那个时候一双布鞋，一身军装，没有任何腐化堕落的各种传闻。仅此一点，今天这样的干部已经非常难找了。

#### ◇ 东炼和服刑

1973年，我28岁，被下放到东炼劳动改造。不过，去东炼和我的化工专业毫无关系。在工厂，工人群众和干部对我都很好，有好多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系呢。工人对我非常宽松，基本没有人迫害我。而且我还能谈恋爱，有时还到山上约会。

厂里有一个女工，叫刘X，她和我认识后，要和我交朋友。她还是那种女孩子崇拜英雄的情结，她感觉我了不起，把我还看作是“英雄”。而且我当时那套道理还是比较唬人的，后来她就一心想嫁给我。我说我不敢同意，我的头上还悬着反革命的帽子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坐牢呢。当时，我对形势的估计，也觉得确实不大安全。她说，没关系，你要坐牢我给你送饭。当然这也就是小丫头这么一说。最后我们也没成。以后，她到日本去了，在那里定居了。前些年，她到深圳来的时候又找到我，我们见了个面。还有韩爱晶等，大概十来个人一起吃饭。她那次还说，我和老蒯有那么一段情，其实我们还有个孩子呢。那是1975年，当时她怀了个孩子，那孩子要活到现在也30多岁了。这种事情当时算是很严重的事，要让组织上知道那还不把我们斗死。所以，我们也不敢要，就打掉了。

1976年周恩来去世，接着毛泽东去世。这两个人的死，都让我很伤心，我的感觉是心里的依靠一下就没有了。我当时也估计是在劫难逃了，不会再有人护着我，也没有人会给我说话了。毛泽东、周恩来有一个在，四人帮就不会被抓起来，我肯定也不会被抓起来。他们都死了，四人帮再一抓，我心灵的支柱完全没有了。1978年4月，一辆吉普车来到东炼，把我再度带回到清华，北京市公安局在那里宣布以反革命罪逮捕蒯大富。当时宣布的反革命罪行里，还有反康生这一条。

再次被抓后，也有领导人讲话提到我。一个是汪东兴，当时他是中央副主席。他讲过，关于清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当时的历史问题。他就点名说，比如讲蒯大富，过去十多年了，处理他的问题，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否则我们就不能让人家心服口服。这是在我被抓起来以后，汪东兴讲的，这话本身是正确的，符合中央精神的，但是没有分量。接着审判四人帮以后，又要准备审判我们的时候，胡耀邦有一次对清华的一个同学说起我。他说，对待蒯大富，从前我不赞成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他整得这么狠。这些是比较有利于我的，但是没有分量。

我对我的错误，从什么层面讲呢，就是想想别人的遭遇，想想我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的损失，判我刑并不冤。比起那些老干部，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受的各种各样冤屈，比我要大的多。那么多德高望重的老革命都吃了那么多苦，何况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没什么大错误，而却被迫害、被批斗、挨打。他们更冤！所以说，我吃些苦，判刑坐牢根本就不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蒯大富无冤可喊。从另一个层面讲，我觉得冤枉在哪里呢？我辩论就主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我没有犯反革命罪啊。如果当时说我罪在武斗，或者说整了老干部，那我比较服气。我辩护的不是这些，我是说我不是反革命，罪名不对。我当年的言行，包括打倒刘少奇这件事，都是在毛泽东指导下做的。我当时举许多例子，来论证我的行为是完全是符合毛泽东的教导，当时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是正确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是冤枉的，其他就谈不上了。

在这件事上是邓小平说了算的，要判多少年，怎么重判，都是他决定的。邓小平这个同志报复性很强，你要整过他，那你就倒霉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还算比较宽大，或者说刀下留人了。在1978年否定文革的高潮中，如果他说把蒯大富拉出去杀了，一百个蒯大富也打不住，也没人敢给蒯大富说话。在押期间，我给外边写过不少求救信，已经忘记了给谁写的了。当时对我的第一份起诉书列了六条罪，比江青、比张春桥还多一条。这六条一看都是奔死刑去的，我估计可能要判我死刑了。我很绝望，就想通过一切途径，获得某种援应。初次见审判长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问他：审判长，是不是准备判我死刑了？审判长说，那怎么可能呢，你最多是从犯嘛，江青、王洪文他们都没有判死刑嘛。你案情怎么也比他们轻嘛，怎么会死刑呢？江青1980年底就判了，我是1983年才开始判的，间隔比较长。他把我定性为从犯，我就吃了定心丸了，估计死不了了。

审判我的时候，也为我请了律师。我的辩护律师就是曾经给江青辩护的傅志人律师。（11）开始，他派了下面一个律师来，那位律师很和善，但根本没有做过法庭辩论。后来我要求他按照我的辩护词进行辩论，他说我请示一下。后来傅志人律师就亲自来了，我和他进行了模拟的法庭辩论。我们辩论了三个小时，他辩不过我。起诉书要定我反革命罪，那我得有反革命动机啊。我说，你怎么证明我有反革命动机呀？我反刘少奇那是反革命动机？我当时听毛主席的指示，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主席啊。后来我反问他，我说：1966年的时候，你当时发现毛主席犯错误了嘛？你和我一样没发现。你当时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吗？你也不可能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你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你也和我一起喊打倒刘少奇。你怎么能说你不是反革命，而我就是反革命呢？

律师后来说，你的辩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的，对法律的理解也是正确的。现在我们不谈法律了。蒯大富，你是聪明人……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审判你蒯大富主要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判你蒯大富怎么得了，全国至少要放一万人。律师的意思是指1978年后各地的造反派头子被都抓起来了。我要不是反革命，他们会说，北京的蒯大富什么坏事没干过，他要没事，那我们做的就更不算事了。所以说，不但不能放我，而且判刑还必须重判！

后来，法庭上我也是按照模拟时那么辩护的，法庭上四台摄像机录像。要是能解禁，我想把法庭的录像档案拿出来看看，挺生动的。当时我父亲和弟弟也去了，法庭休息的时候，他们问那些旁听的政法大学的师生：蒯大富辩护得怎么样？那些人回答：蒯大富说的都是站得住脚的。我法庭辩护的时候非常认真，也非常有力，审判长就跟检察院商量，说这个起诉是不是太重了？检察院可能也觉得有点过了，就把起诉书收回去了。我高兴死了，还以为不起诉了，可马上又给我发来了第二份起诉书。后来，审判我的审判长，私下里跟我讲，所有四人帮案子的审判中，你的辩护是最有力的。但法庭上，驳倒归驳倒，判还是要判的。因为共产党比法大，制定法律的都在违法。最后我被判了17年有期徒刑。我当时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了，还是有盼头。我出狱的时候42岁。

#### ◇ 尘埃落定看文革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一个就是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经把持了毛泽东不能容忍的那么大的权力，他们有时候反对毛泽东的决策主张也是很坚决。比如彭真说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一个字不许发，那就是一个字发不出来。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更主要的在于，当时毛泽东提出来，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以后呢，又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实际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与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们觉得毛泽东当时思想的精华就是这个，所以就死追这个。我大一的时候就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所以对此深有体会。我当时自认为对毛泽东的这条吃得很透了，坚决相信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反修

防修，是一心想把共产党搞成清正廉洁的政府。

用“全盘否定文革”这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文革，显然不够科学。这样一个由毛泽东发动领导的，八亿人口参加的，搞了十年的运动，全盘否定不符合事实。应该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否定的否定，不应该否定的就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但是这个方式错了，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这两个极端，都不能长治久安。但是如果因为害怕暴民，就把“四大”这些大民主的手段全部否定掉，又不建立法制监督，那么人民就失去了监督政府的手段，像现在的情况，那就放任当官的腐败下去。为什么总会有突发性事件，就是人民失去了监督的权利。

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共产党打垮，如果共产党将来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内部腐烂透顶，导致自己的灭亡。而当前这种严重的大面积腐败，恰恰就是不科学地全盘否定文化革命的后果，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反思。文革中很多东西可以经过科学的改造加以利用，八亿人口，这么大的党，这么伟大的领袖，搞了十年时间，说这里面没有一点好东西，那是不对的。好多人怀念毛泽东，实际是怀念那个时代干部的廉洁，人民有说话的机会。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最后导致邓玉娇把干部捅死了，或者通化钢厂的工人把一个经理打死了，这是很恶性的。由于缺乏渠道，要不就没地方说话，要不就恶性爆发。怎么能搞出一套让人民充分实行当家作主权利的、在法律保障下有序参加的、能监督公仆们让他没有机会腐败、让他腐败了以后能受到严厉惩罚以至于他不敢腐败，这样一套制度的建立，就应当吸取文革正反两方面的东西，那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路。这是总结文革教训需要真正认识到的。

现在的领导人思维啊，有些不可理解，怎么就让目前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呢？基本态度就是拖，想把这些问题矛盾往后推，挪到下一届让别人解决。核心的东西就是害怕乱，但是真的要害怕乱，就要把乱的根源解决掉。乱的根源没解决掉，那将来还是要乱的。好比“六四”平反的问题。有人会操作的话，得分会很高的，而且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也不动。这事拖到什么时候，拖多久也得平反。不然，全世界人民面前也说不过去啊。北京人民是记得很牢的，说北洋军阀、蒋介石，什么“3·18”惨案、什么“12·9”啊，整个加起来也没有“六四”杀的人多。你怎么能想象共产党军队向老百姓开枪呢，这没法解释啊。完全用一种实用主义取代了共产党人的理想。

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有魄力的领袖，他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王国，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当。他这个人，无论如何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了不起，不信邪，敢和美国人斗，敢和苏联人斗，敢于硬碰硬。美国之所以和中国平起平坐，或者对中国友好，实际上和两场战争非常有关系，一场是韩战，一场是越战，要脱离当时历史情况就不理解这个。美国人你不把他打得知道疼啊，他就不会买你的账；在越南战场上你不把美国人打趴下打走了，尼克松不会到中国来的，而且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毕恭毕敬。中国这些年有这样的国际地位，离不开毛泽东奠定的基础。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情弱者，同情弱势群体，同情草根阶层。所以现在的弱势群体呢，工人呢，农民呢，还怀念毛泽东。那时是强调工人掌权，工农掌权，当然实际上那是不完全真实的，但那个时候工人农民说话还是有机会的，不像现在这样。我非常欣赏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当时坚定地跟着毛泽东，就因为一个看毛泽东反修反腐败，另一个看毛泽东比较能维护弱势群体。

毛泽东当年想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一个长期的让政府不腐败的办法，创造这么一种制度。但是，毛泽东理论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他想创造这种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会制度，而这种社会却维系在他的领导之下，一旦没有他的领导，这个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这个制度下

面是极端的大民主，上层却是极端的集权专制，这两个极端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时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说觉得毛泽东的做法有道理吗？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论是一种很不彻底的理论。比如说“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为标准，那谁的“反”都应该可以造的啊。但我们那时反康生，后来也反陈伯达，他都不答应，更别说反林彪、反他本人了。这又是个悖论，就是对有的人可以造反，对有的人不能造反。他这个划分是以他自己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真理为标准。结果呢，真理是对别人的，而不是对自己的。当时我也很难理解这一点。

文革当中群众蜂拥而起，这个发动的深度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毛泽东这点上又有一大失误。你把群众从基层发动起来攻击政府，攻击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不在一个很严密的法制范围来控制的话，那肯定就会出现暴民政治。这实际上就和武斗一样，他搞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也就在这上面。

再者，毛泽东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们也感到很恐惧。心里也在想，主席怎么打倒这么多干部呀？几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县都没什么好人了，简直太厉害了。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向你反扑，你肯定挡不住。我们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顺着他的这个路子走的。几乎毛泽东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我们打到哪儿，哪儿就垮了。为此我们曾经也特得意。

文革当年，我觉得全国这个力量对比，基本上我们这边的人，属于我这个观点和立场的，也就是比较符合文革主流思想的造反派，占三成，所以我们是光荣孤立；保守派能占到四、五成，保守派和我们差不多是五比三的实力对比；另外两成是出身不好的或逍遥派，就基本不参加运动了。当时我们也真感到心虚，有可能会失败。就是觉得我们能真正依靠的人太少了。尽管如此，我当时认为，即使毛主席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也会跟着毛主席一起上山打游击。当时也有心理准备，觉得文革可能失败。当时在我们很猖狂的时候，心里也觉得没底。毛泽东当时依靠和信任的那一部分人，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打倒了。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1968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迫下，毛泽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回头看自己这一生，是一种什么心境？在无法摆脱的那个特定历史环境的前提下，我不为自己曾积极参与了文革这个“试验过程”而后悔，但是也深有忏悔，特别对于由于个人错误导致的损失而内疚不已。

#### ◇ 今天的忏悔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和人道主义，要在当时的那个背景下去看。

文革中打人，最早起来打人的是高干子弟，包括八·一八后的“破四旧”、“红色恐怖”，这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后来在大学生揪斗干部的时候，也动手打人，好像是从第一次在工人体育馆斗彭真那次开始的。那时是所谓革命利益至上，根本不讲什么人道主义，尤其后来毛泽东发表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认为这场政治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那么我们这些人的理解就是一场战争的继续，打人、武斗、暴力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事。在没有法约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变成暴民政治，或者叫什么群众专政。群众没有法律约束，就叫无法无天啊，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专政，那时的群众专政绝对是暴民专政，完全不讲理的。就是什么程序都没有了，抓过来就算。比如说当时清华井冈山下面有保卫组和专案组，抓人一

般都是我下命令抓的。打人的事我也管过，给专案组强调过，不准打人。但是下面也偷着打，后来我们有过三次检查，都被掩盖过去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直到后来发生闷死罗征启弟弟的恶性事件。

罗征启老师是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属四一四那一派，据说有不少反江青、反林彪、反文革的言论，我们这一派曾把他抓起来，整得很厉害。结果他逃跑了，我们怎么也抓不住他。他有个弟弟，是北京仪器厂的普通工人，我们在一次抄家行动中把他弟弟抓住了，想通过他弟弟找到他的下落。抓人的时候，他弟弟喊叫，抓他的人就用棉丝塞他的嘴，结果塞得太深了，使他弟弟窒息而死。与此事件相关的三个同学去自首了，当场就给关起来了。我知道后也支持他们去自首。后来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清华大学在文化革命中凡是有人命的人，包括武斗，不管是打死工人，打死学生，或者打死干部的几乎都判刑了，基本上都是15年。

罗老师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胸怀坦荡、非常正直的人。文革后，他曾支持一位伤害过他和他弟弟的同学上研究生，这在清华大学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后来，胡耀邦总书记看中了罗征启，准备提拔他当团中央书记。但是，罗老师这时却提了一个常人看来很不合时宜的意见，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孩子在清华读研究生，想出国留学，要挤占别人的名额。罗老师针对此事提意见，说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容易搞特殊化，还是应当先放到基层锻炼锻炼。他还以为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会支持他的意见，结果反而是他自己没能被提拔上去。另一件事是六四的时候，他当时是深圳大学的校长。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并带头签字，以深圳大学党员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学生运动，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此信被港、台、日本等媒体转载，影响很大。事后整肃的时候，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甚至荒唐到被开除了深圳户口。他对我说：蒯大富，你当时整我的时候，大喇叭一广播就召来几千人参加。而深圳大学决定开除我党籍的时候，要有个支部大会的程序通过，但这个支部大会就是召集不起来，大家都找借口不参加。后来党委开除他党籍只能是违章操作。我看过他写给中组部的信，那么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因为得罪了中国最有势力的两个人，那么忠于党也没用啊。他党籍被开除了，也没有了收入，他就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不过他坚决不离开深圳，深圳的户口后来总算给恢复了。

现在每年逢年过节，我都要去看望罗老师，真诚地向他表示赔罪和道歉。罗老师等于是原谅我了，他说你们当时是小孩嘛。我们有些活动也请他参加，他也给面子。我感到罗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境界高尚的人，为人楷模。我们把他弟弟整死了，还把他差点整死，他却还能宽恕我们这些认罪的人，并且帮助我们这些人。

我对武斗这个事，对清华武斗中死去的那些人，我再三地忏悔。我们当时很少找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进行比较深入的谈话，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以建立共识。当年由于不了解对方，最后就想象他们如何如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事后虽有些沟通，但很晚了，后果已经造成了。由于我的错误导致的损失太大了，最严重的是武斗。清华搞武斗，那肯定是我的罪过。当时我完全可以控制局势，要是我坚持不打，实际上清华武斗打不起来。因为当时在团派里，我的话是起决定作用的。因为我变了，就煽动打起来了。后来虽然知道这步走错了，又不愿意认错，就坚持着。再到后来，想停止也停止不下来了。

因为我的错，有太多的问题，太多的内疚。武斗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和我自己相关的人就死掉十几人吧。我的一个同学，和我不是一个系，他跟我私人关系非常好，叫谢晋澄。他就是武斗期间被汽车轧死的。文化革命初期，工作组把我打成反革命，他当时坚决支持我，在我大字报上写批语：你是好样的！坚决支持！人在困难的时候，有人支持是很难忘的。但是分成两派以后，他参加了四一四。武斗中双方抢粮食，我们这边的汽车过来，四一四的人要阻拦，汽车往前冲，乱哄哄的，一下被撞上就当场轧死了，纯粹就死于非命。那是非常好的同学，我

非常难过。

文化革命期间，我也整过很多人，包括中央高层和清华的干部，或者对立面的群众都有。但我可以说，我没有因任何私利去做这些事，都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造成的，认为他们是毛主席的敌人，是公敌。学校有个饶慰慈老师，她当时教我们党史，她讲毛泽东四渡赤水的故事，讲得非常好。文化革命中，她支持四一四，关键是他们私下议论的时候，议论到江青、林彪，说了些当时被认为很反动的話。她最后被我们团派的专案组抓住了，打得很重，受伤比较厉害，被打残了。前几年，我通过饶老师的朋友向她表示对不起，我想看望她，就是表示认罪的意思。她不想见我，我也理解她不愿再回忆起这段历史的痛苦。

回过头来看，文革是一种历史的“试错”，它完全脱离了实际。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是错误的理论，错误的道路，也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损失。我现在还是特别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模式，我非常想知道中央领导人关心不关心这个。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你只要让专家、让明白人研究的话，肯定能找出条路来。不要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而既要保证社会平稳的发展，人民过上好日子，又能监督共产党不腐败，或者是不那么腐败。否则文化大革命的学费就真的白交了。

注释：

1．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文革初期的临时权力组织称“文化革命委员会”，后期的权力机构称“革命委员会”。

2．编者注：韩爱晶对此提出更正意见，他记得应当是开了三天会，应为9月18日起，20日结束。又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此处蒯大富记忆有误。

3．这个大会是以北航红旗等组织为首筹备的。

4．文革中七机部的一派群众组织。

5．见前注。

6．据《王力反思录》的记载，与此有很大出入。编者于2010年12月29日再次求证于蒯大富。蒯大富答复：“1991年夏，我在北京蓟门桥王力家。王力对我说，66年底张春桥见你，让你反刘少奇实际是主席的意思，我们文革小组都知道。他夫人在家，我记得很清楚。可能王力记混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

7．即邓颖超。

8．据聂元梓回忆：蒯大富在清华搞“百日大武斗”时，我怕他误以为是我在北大大搞武斗而影响他，因此，我和红代会的陈良把蒯大富找到北大来，就在北大的一院二楼。我说，北大的武斗不是我搞起来的，也劝他不要搞武斗。结果没起什么作用，蒯大富说：“现在是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了，非打不可。”《聂元梓回忆录》，第281页。另据编者对聂元梓的访谈录音记录。

9．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挥上海工总司的十万工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武斗历时一天，死亡18人，983人受伤，之后“上柴联司”663人被关押。

10．根据编者的了解，对蒯大富的这一说法存疑，并为此咨询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的有关专家。他们

表示，根据他们目前看到的档案资料，不支持蒯大富的这一认识。对此另请参阅中共党史第二卷的相关内容。编者征询蒯大富的意见是否删除，他仍保留他的这一认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

11．编者注：韩爱晶纠正，蒯大富的律师不是傅志人。

~~~~~

【往事追忆】

## 我在清华大学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 王大定 •

1966年6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的大学学业中断了。我所在的班——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6902班（当时简称为“化902”）成了全校最有名的班级。班上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蒯大富。我也被卷进了文革漩涡，当了“造反派”。

### 一、文革前的政治气氛

文革之前，国内的政治气氛已很浓重。中苏论战，发表了“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二评”，“三评”，直到“九评”。学生们相信了宣传，苏联“变修”了，我们要“防修反修”。之前，我们都知道南斯拉夫已变成了“修正主义”。另一个重要的政治运动，就是全国大学毛主席著作。自林彪主持解放军工作之后，全军学毛著，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形成一个学习的高潮。清华“突出政治”也抓得很紧。当时，我对学习毛著是很认真的，毛选四卷通读不止一遍。我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政治课代表，当然更得带头学。而现在看来，那时的“学习高潮”，实际上是搞个人崇拜，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个人专断，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文革前奏，是《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的这个历史剧是为彭德怀翻案。接着就是批判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即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后来我们知道，这是毛主席向北京市委动刀。顺便提一下，邓拓的女儿邓小兰，是我同系、同级的同学。邓拓是含冤自杀的。尽管他一生忠于毛泽东，毛泽东仍把他推向绝路。吴晗的一个外甥女叫做宋滇，她与我同系，高一年级，担任我这一年级的政治辅导员。文革中她的家族受害，她仍然靠拢“造反派”，我猜想她是由于害怕，所以违心地靠近这一派。到毕业分配，她被分配到沙城农场，那是当时“黑五类”子女去的地方。

### 二、文化大革命开始，造校党委的反，工作组进校

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校园内出现了“揭发”彭真的大字报，说彭真是混进中央的修正主义分子。这时我才注意到，报纸上很长一段时间彭真没露面了。记得1965年，北京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曾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演出节目，清华担任最后一幕戏叫“北京学生支援全国学生运动”，我班全班同学参加了这一演出，扮演的是在天安门前游行的学生队伍。谢幕时，彭真上台来与演出的学生合影，前排的学生还和彭真握手。文革开始，人们就知道，北京市委被改组了，彭真被撤职，李雪峰调任市委书记。毛主席说原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

1966年6月2日那天，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那篇著名大字报（即被毛主席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清华园就混乱起来了，学生停课闹革命、纷纷写大字报。部分大字报直接批判清华党委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忆那时主要论点有：北大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难道清华不是？清华沿袭欧美教学方式，建国后作院系调整是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教材也是参照苏联的教材编写的，苏联已经变修，清华的教育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党委书记蒋南翔执行的是“教授治校”——“108将”治校（据说清华有108位教授）。先前在反右斗争中，蒋南翔打垮了治校的教授这一股强大势力，划定了很多右派；他站稳脚之后又分批为右派摘帽子，因为教学最终还得教授担当主导作用。文革来了，学生们又利用反右斗争作借口用来批判蒋南翔。还有一个观点是说蒋南翔贬低、反对毛泽东思想，理由是蒋南翔把毛泽东思想称作马列主义“高峰”，而林彪称之为“顶峰”，高峰没有顶峰

高，所以是贬低、反对毛泽东思想。

这些观点，现在看来是多么荒唐可笑，但当时却是堂而皇之的响当当的观点，谁也不敢反驳。

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因为《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突出政治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上》（批判罗瑞卿搞军队“大比武”是不突出政治），我看了这社论，联系到清华推行的“突出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就写大字报说清华也不突出政治。现在看来，“突出政治要落实在思想革命化上”，完全是一种空论。当时我头脑发热，也就写了这张大字报——其实，我自己一向也是注重业务学习的。

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写大字报反清华校党委的学生，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之子贺鹏飞、李井泉之子李黎风、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等一批高干子女。一般学生哪敢写反党委的大字报？反右斗争的教训铭刻人心。文革进一步的发展，这些高干都被打倒，其子女们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些子女为什么在开始时那么积极？我猜想，是这些高干都上当受骗了，他们以为揪走资派只到彭真为止，而又看到毛泽东要造教育界的反，蒋南翔当过彭真的秘书，所以让他们的子女带头行动，迎合毛泽东，又可以使子女获得政治资本。有一种观点是：刘少奇为了保自己而抛出了蒋南翔，是政治上的舍车保帅。

大字报使全清华一片混乱，蒋南翔也组织人写大字报，肯定校党委的成绩以自卫。但是自卫没起到作用，6月12日，北京新市委李雪峰派工作组进驻清华园，宣布蒋南翔停职检查。这就意味着蒋南翔及清华校党委被打倒（这里注意，是被工作组打倒的，不是学生们打倒的），学校权力归工作组。成立了“清华大学文革领导小组”，校一级组长是贺鹏飞，还有刘涛、李黎风等人。各系各班都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文革小组。到我班的工作组人员叫张茜薇，她是领导过海陆丰起义的烈士张太雷的女儿。我班文革小组组长是蒯大富，我是成员之一。

这样，以对党委的态度，全校师生第一次被划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或称“反蒋派”和“保蒋派”。自此，党委成员都被称为“黑帮”人物，受到大会小会批判（这里注意，第一阶段的“造反派”是贺鹏飞、刘涛、李黎风等高干子女）。

这段时间北京各高校的情况很相似，党委都被打倒，都陆续派了工作组，成立了以高干子女为主的文革领导小组。全国各地陆续掀起了造党委“反”之风。

现在回想：当时为什么那么多学生参加造反？是什么动机？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上上下下的政治教育，都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些说教深入人心。学生们积极拥护中央决定，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崇拜），凭着一股政治热情参加运动，起来“造反”。所以，实情绝不是现在社会上笼统认为的，是什么一批坏分子起来造反。例如，刘涛、贺鹏飞这批高干子女就是最早的造反派。再例如，当时我班十二个给党委写大字报的同学，十一个是团员（包括我，当时的团支部宣传委员），一个是党员（当时的班长）。当然，学生的这种热情是很幼稚的，盲目的，历史证明这种热情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了党内权力斗争的工具。

### 三、怀疑工作组和“反蒯”斗争

清华大学在工作组和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大力批判蒋南翔为代表的校党委，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可是，没几天传出一阵风：工作组竟是旧北京市委派来的。有个姓王的学生首先贴出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这股风从何而来？当时我不理解。现在有一种解释，是中央文革小组



散布出来的。但是，也不一定如此。当时，时兴一句话：要“怀疑一切”，据说是马克思说的，学生中也容易产生怀疑工作组看法。

我班的蒯大富迎合了这股怀疑风，对工作组提了不少疑问。大概是6月22日吧，全班被召集开会，除张茜薇外，到会还有一位工作组人员，不知姓名，显然比张的职位高。他们说，知道化902班的同学对工作组意见较多，特来听取意见。会上多个同学发言，蒯大富发言最多。当时提了些什么意见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我没发言。第二天，清华轰动了。原来，蒯大富在晚上集合了我班十位同学（十位中没有我）写了大字报，《叶林，这是怎么回事？》一式二份贴在两个地方以供更多的人看。大字报上称，工作组到化902班开会，是套取学生的情报，因此质问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此大字报造成了清华园更大混乱，工作组难以再继续维持工作了，不得不组织全校“大辩论”，以期批倒蒯大富，压制住怀疑工作组这股风。1966年6月24日晚，在大礼堂，工作组安排了我班部分学生为一派，蒯大富等人为一派进行辩论。观看的学生挤满了大礼堂，可以想象，对工作组持怀疑态度的人挤进来的较多，所以工作组控制不了会场，我班的学生被安排坐在中间前两排。这次会上我自己跳上去说：“蒯大富这个大字报我是不赞成的，而工作组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是挑动学生斗学生。”当时，《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我记住了这句话，认为工作组是“挑动学生斗学生”。我这是各打一巴掌。因为这句话，我虽然没有给工作组写大字报，也不赞成蒯大富的做法，后来仍然被打成了“蒯派”人物。辩论会乱哄哄地散场了。蒯大富后来认为这个会是他的胜利，在1967年6月24日还开过小型会纪念这个日子。

“6·24辩论”动摇了工作组的权威。6月27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却发票参加，反工作组怀疑工作组的人都不准参加，我也没让参加。事后知道这是传达中央精神，反击赶工作组走的“反革命潮流”。全校整顿，凡有怀疑工作组言行的学生，都成了批判对象，被称为“蒯派人物”，相当于“反革命”，被押管起来，丧失了自由。全校好多班都有这种人物，但各班也只得个别几个吧，而我班最多，除了在蒯大富那大字报上署名的十位同学，还有我，另一位对蒯有支持言论的同学，共十二人。蒯大富是第一号人物，由上一年级的学生看管。其他的被分押到化9年级各个班看管，我被分到化903班看管。建国以来，我国的政治运动真是多，运动的对象往往被隔离看管起来。我第一次尝到被看管的滋味，心中很害怕，感到很恐怖。全校展开了“反蒯斗争”，各系，各班都批判“蒯氏人物”，铺天盖地，成了运动的中心。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全系大会，批判蒯大富，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说蒯大富是校党委留下来的定时炸弹，是校党委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其实这些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就在几天前，蒯大富是写大字报反校党委的。文革中的大批判，总是“上纲上线”，无限上纲，往死里整。一次次的批判会，蒯大富就是不承认错误，不接受对他的批判。而我却没有他这一精神，赶快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写检查。

蒯大富虽被看管起来，某一天，他写了一张毛主席语录贴到宿舍楼“新斋”门口，表示了坚持斗争的意思，以后每天贴一张。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戚本禹去见了蒯大富，给他放了点风，说有重要人物支持他，要他对抗工作组的批判，所以他又强硬了起来。

除了蒯大富之外，我班“蒯派”人物一个个地被全年级学生轮番批斗。有一天轮到开会批判我，突然改变了，宣布改成全校批判蒋南翔的大会。自此，就再不批判学生了，专门批判校党委。某一天，我班全班同学除蒯外，被工作组带到甲所开会，那是清华校党委原来办公的地方，我第一次进这么高级的会议室，很大的玻璃镜子，高档的会议桌和椅子。我们围着桌子坐定，进来一位中年妇女，穿着短袖衬衣，坐到靠我边上的椅子上。我当时不知道她是谁，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王光美主持会议，与我们交谈，我感觉到主要内容是给受批判的同学消除点压力，但要我们与蒯大富划清界限。会议约一、二个小时。会议毕，让王光美先出了会议室拐入某个房间，才让大家离开，有点神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光美。

又过了几天，大礼堂前贴出一张大字报，只有简单几句说“北大工作组撤走了”。紧接着，众多的大字报贴出来了，报道北大工作组的情况，报道江青在北大讲话，控诉工作组迫害她女儿。马上，清华的工作组再也控制不了局面，撤走了。批判学生的善后工作由学生来做，我的检查都退回给了我，903班的同学当着我的面，将审问我的记录扯碎扔掉。

大约是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部分学生大会，会上刘少奇被迫作检查，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清华就这样经历了派工作组，怀疑工作组，批判学生这一个阶段。北京各大专院校都有相似情况。现在回忆，有两点看法。

1，派工作组本身不是错误的，建国以后多次运动都有派工作组的形式。例如，就此前不久的“四清”运动，清华的学生约一半都去当过工作组成员。但是，这种批斗学生的方法是错误的。历次运动，比如反右斗争，都有批斗，文革中就特别激烈了：工作组批斗校党委、批斗学生，后来又被学生批斗，王光美也被清华学生批斗。现在看来，批斗人完全是违反宪法的，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伤害他人。但愿中国今后不再发生这种批斗的事，要按法律办事。

2，文化大革命开始不几天，毛泽东就离开北京，让刘少奇主持工作。这可能是一个阴谋。就是让你负责，而又让中央文革这些人暗中制造麻烦，煽起怀疑工作组的风，然后适当的时候回到北京，说你执行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作为打倒你的理由。现在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搞文革的主要动机就是要打倒刘少奇。

#### 四、清华大学的红卫兵

工作组撤走了，文革小组掌权，继续批判校党委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可是受过工作组整的学生不答应，要批判工作组，叫嚷要把工作组负责人揪回清华批斗。这样，以对工作组的态度，学生们又重新划成了两派。1966年8月8日，反工作组一派的学生在大礼堂开串联会（我参加了），鼓动组织起来批斗工作组，后来就称为“88派”。8月9日，另一派也在大礼堂开会，后来就称为“89派”。这样，清华大学以对工作组态度第二次划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第一次“造反派”中的高干子女，一般变化成了第二次的“保守派”。

组织“红卫兵”，是从清华附中开始的吧，我不是很清楚。清华大学则由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刘菊芬等人为主要领导，“89派”学生为主体，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没有参加这个大会（以后的几次，我也没参加）。在纪录片中看到，毛主席穿上军装，红卫兵代表上了天安门（清华的代表是刘涛等几位）。清华的“88派”成立了另一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清华就有了两个观点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带上了袖章。但这时的“88派”红卫兵认为，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但也不是英雄。蒯没有参加“88派”红卫兵。

1966年8月22日晚，周恩来总理到清华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在西大操场上搭了临时讲台。那天晚上断断续续下着小雨，台下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呼喊：“给总理打伞！”总理却一直不让打伞，冒雨作报告。总理的报告，讲了工作组这样批斗学生是错误的，但是，也没说怀疑工作组就是正确的。对蒯大富，周总理讲，蒯大富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也没说他是英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直接听周总理作报告。周总理的报告，很快根据录音整理刻印成册子，我可惜没保存一本。

清华园接下来这段时间，是两派互写大字报攻战。我召集我班的十个人（十二个被工作组批斗的学生中，将蒯大富及另一位同学排除在外，以示和蒯大富有差别）写大字报，控诉工作组对我们的迫害，同时也批判保工作组的观点。即那时我们也要与蒯拉开距离。

不久，北京城内兴起了“破四旧”。结果却是破坏文物，抄家、打人、打死人等一系列搞破坏的违法行为（这里要特别指出，这些是以高干子女为主的红卫兵干的，与清华后来的“井冈山红卫兵”无关，与蒯大富无关）。在清华大学，保工作组这派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刘涛、贺鹏飞这派的）为表示“革命”，拆毁了典雅的清华二校门。那天，我听到高音喇叭喊，要拖拉机开到二校门。据说，那天将“牛鬼蛇神”（即被打倒的校级领导）叫到二校门搬拆毁的砖块，一边搬，一边还得喊“我是牛鬼蛇神”，否则就挨打。

清华的二校门被作为“四旧”拆毁了（注意，不是蒯大富这派干的）。1967年在清华“井冈山”即蒯大富掌权的时候，在二校门废址建了一个毛主席挥手的全身塑像，座台刻上由林彪亲自给题字的“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四个伟大”的题词。落成时我们围着瞻仰。这是文革中第一个毛主席塑像，此后他的塑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北京各高校，在全国各地树立了起来。我毕业后到甘肃工作，路经兰州就见到在东方红广场树了一座巨大的毛主席像。清华的塑像是站立挥手姿势，同学们纷纷留影，照片上写“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班毕业前夕，全班在毛主席像前合影，现在我班每个人手中还有这张照片。文革后期，全国的毛主席塑像纷纷被拆除，清华的也被拆除了，在原址照原样重修了二校门。现在见到的，就是重修的二校门，清华已将之作为注册图案，此是后话。

两派红卫兵混战一阵子，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到了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即反工作组的这一派就占了上风。

刘少奇在党内的位置由第二位下降到第七位，接着通知下来，收缴刘少奇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表明刘少奇已经开始被整垮。当时，我心中庆幸自己站对了队。

蒯大富虽然是反工作组的第一干将，但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仍把他排斥在外。9月份，蒯大富着手组建“井冈山兵团”。我开始时犹豫，迟迟没加入他这个兵团，蒯大富问我：“是不是害怕了？”我被他激将，就加入了“井冈山兵团”。之后由我主持成立了“井冈山工化系分部”，任负责人。

1966年10月3日，在北京首都体育场召开10万人的红卫兵大会，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全都到场。这个大会上，让蒯大富担当大会主席，这样，就把蒯大富摆到了一个“革命英雄”的位置，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10月3日大会表明了中央文革小组对蒯大富的支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就猛烈扩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入了“井冈山兵团”，而“清华大学红卫兵”销声匿迹了。清华大学一时成了蒯大富的天下。

1966年约11月份（本刊注：应为9月6日），若干院校红卫兵联合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江青，康生等人都出席坐在主席台上，蒯大富作为“司令”（本刊注：“三司”主要负责人即所谓“司令”当时是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带领大家念誓词“……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献身……”。我参加了这次大会，坐在主席台下前几排，清楚地看到蒯大富与康生言谈说笑。因首都红卫兵已经有了两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就称为“第三司令部”，后来就简称“三司”。“三司”声势最大。

自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全国进入了串联高潮，坐车不要车票（在北京，一段时间内吃饭也不要钱），我在12月份也出京串联考察了一个月，去了长沙。长沙也出现造反和保守派，

我与造反派有过接触、表示支持，但没做具体事情。在长沙，去了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那时是湖南省委组织的，每天几辆解放牌大卡车免费接送去参观，每人还发一枚毛主席纪念章。

我与两位遇到的北京中学生步行到宁乡“串联”。这里我做了一件当时是“革命”的，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事。宁乡是刘少奇的故乡，宁乡县城食品公司的橱窗里挂了一幅画——“刘少奇故居”，是一座高楼门大瓦房。我与两位中学生写了张大字报说他们保刘少奇，欲贴到玻璃上。公司的负责人马上出来，没谴责我们，客气地说：“不要贴大字报了，我们马上把这画取下来。”第二天就不见此画了。宁乡县政府客气地给我们安排汽车票让我们回了长沙。

## 五、“井冈山兵团”及其“批斗王光美”，毛主席接见蒯大富

现在回忆起来，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始，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操纵和利用，充当了打倒刘少奇的工具。当时这些学生自认为是“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是完成光辉使命。“井冈山兵团”第一个到北京城游行，公开在社会上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我没参加这次活动）。两次“批斗”王光美，从身心上打击国家主席，我参与组织了这两次批斗会。

### 1、第一次“批斗”会。

1967年元月6日，我班一位同学带了一些人到建国门外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去抄杨献珍的办公室，想找到“材料”批判杨献珍。但没达到目的反而连人带车被扣下了。井冈山兵团总部办公室主任潘某，让我去调解将人要回来。回来之后天已黑了，潘突然告知我，王光美抓来了，立即批斗王光美，让我先集合工化系学生队伍，先围好主席台。

原来那天，王光美在北师大附中念书的女儿要在大会上做“检查”（她支持工作组积极参与了批判学生），清华水利系几个学生想到了一个鬼主意：他们将她控制住，连哄带吓，让她给她妈打电话说出车祸了，在儿童医院做手术。女孩年幼无主张不得已就打了这个电话。水利系的这些学生控制住了儿童医院所有的电话不让接，在儿童医院等着。王光美在刘少奇的陪同下来了，这些人不顾国家主席及夫人的尊严，将王光美塞进吉普车就拉到了清华。我集合学生围好西大操场主席台后，高音喇叭响了，通知全校师生到西大操场开重要大会。很快操场上挤满了人。这种会总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或重大的人物来临，所以学生总是积极来观看。我在主席台上，看到王光美被带上来了，外面套了一件军大衣。北京元月天很冷，这军大衣是学生们去农村参加“四清”时借用的。这时，一位中年男子匆匆来到了主席台，自称是周总理的秘书，总理派来的。他说：“总理知道这事以后非常着急，打电话到清华没人接。要我来向清华学生交待，一、王光美来了可以批斗；二、不能打她侮辱她；三、批斗之后送回去。”后来听说，总理知道这事之后非常气愤，说“这是法西斯行为”。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总理也不能果断地将王光美接回，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派人来关照王光美不要被打着。

批斗会毫无准备，学生乱哄哄地“批判”，王光美亦随口辩答。我的感觉是，学生说不过王光美。因学生们只是按照报纸上写的或听说的王光美“罪证”来“批判”。这些“罪证”往往不是真实的，王光美的辩护也就显得有理。这次“批斗会”蒯大富不露面以留退路，若上头实在怪罪下来就说是“别人瞎搞的。”

过了几天，清华《井冈山》报整版刊登一篇文章《智擒王光美》。这时候的清华《井冈山》报发行量仅次于《人民日报》。蒯大富拿回这一报纸在宿舍对我说：“戚本禹称赞说：‘这篇文章真好，可惜《人民日报》不能登。’”这就是我所经历的第一次斗争王光美，也是我第二次见到她。

### 2、第二次“批斗”王光美。

第二次批斗会是1967年4月10日，是“中央”，是周总理批准的。此会事先做了准备。4月9日夜我的任务是派人守住各校门阻止人拥进清华挤会场。会场设在清华主楼前的广场，主楼的跑车台作为主席台。体育学院的学生先到，负责维持秩序，将会场围成几个区域。我集合工化系全体学生和员工坐到最前排围住主席台，阻止人们拥上主席台。那天人山人海。主楼前广场东西约300米，往南延伸，超出了校院直到五道口都挤满了人，据说那天有30万人参加，是群众组织召开的人数最多的大会。我坐在主席台西侧第一排，王光美就站在我座位的前面接受批斗。主席台东侧的前边，蒋南翔，彭真，杨尚昆，薄一波四人陪斗。批斗会开一段时间，将王光美带入主席台后的主楼内，休息一会儿被换个打扮再站出来。如各种报道上说的，王光美被仿出访印尼时的打扮穿件旗袍，用乒乓球作一串“项链”带上。王光美不作反抗，但也不卑不亢站那里，任由批判者怎么讲（不准她说话）。我班的一位同学代表我班发言。某系有一位同学是在被工作组批判时去卧轨自杀弄断了两条腿，也安排了发言。

这就是第二次批斗王光美，我参与了这件事，是我第三次见到王光美。很快，批斗会的照片传遍全国，现在，在网上还能见到当时的个别照片。这次批斗会，是“中央”将王光美交到群众组织手中受“批斗”、受污辱。说明这时，毛泽东已成心将刘少奇打倒，将几十年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战友当作仇人整治。批斗王光美，是对刘少奇的直接打击。我们这么一批学生抱着“忠于毛主席”的热情，充当了打倒刘少奇的打手。当时是“革命行动”，现在看来完全是错误的。但是，这些错误行为，也不能怪我们，当时的年轻学生是受了利用。

### 3、毛主席接见蒯大富

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见了蒯大富。那是一次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大会，蒯大富被邀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周总理将蒯大富介绍给毛主席。在毛主席伸手，蒯大富伸手，两手将接触时，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过几天在宿舍，蒯大富高兴地将照片拿给我看。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那时是最光荣的事。这次接见说明了毛主席对蒯大富的支持。

## 六、“清华井冈山”的分裂

“清华井冈山”自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合并伊始，就有思想差别，就有权力之争。有一批更激进的人，组成一个战斗队叫做“廿八团”，据说林彪在井冈山是“廿八团”团长，以此起名表示像林彪那样忠于毛主席。“廿八团”是蒯大富的嫡系部队。而另一派人，似乎主张比较温和、更策略的“革命”。这另一派人终于在1967年4月14日召开串联会，宣布脱离蒯大富独立。自此清华井冈山分裂成两派：“团派”和“414派”。我是当然的“团派”成员。

这样，清华大学就第三次形成了两派，两派都是造反派，而团派更激进。

井冈山分裂成两派之后，工化系团派的人认为我太软弱，在一次会议上起哄推举我班另一位同学当分会头头，我也有些厌倦不想干了，趁此甩掉了这一职务。几十年后同学再会时，我班这位同学说：“大定，你还记得不，是我把你赶下台。”大家一笑了之。我虽然再没当这头头，仍然是团派的人，参加了一些活动。主要的一次是“揪刘火线”。

清华“井冈山兵团”一直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充当反刘先锋。大概是1967年7月份，集合浩荡的队伍到中南海门口示威游行，高喊口号“打倒刘少奇”、“将刘少奇揪到清华批斗”。这一行动，据说是蒯大富受到了张春桥的指使。当时我是作为工化系的领队人员之一参加的，在中南海西门喊了一阵口号就回校了。之后各院校响应声援，惟恐在“揪刘”行动上落伍，到中南海门口闹哄了好多日子，把这称为“揪刘火线”。

清华的两派争斗，完全成了春秋无义战，后来我基本上不参加派别活动了。我得到8月1日的不要钱的火车票回家玩。8月2日到武汉就知道了：8月1日武汉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进行横渡长江活动。因为观看的人太多，后面人将前面人挤到水中，淹死了几十个人。那时不少地方年年搞这种横渡纪念。我到了家乡湖北郧县。郧县当时出现了多个造反派，矛盾重重。我动员各派协调合作，没起到什么作用就不再介入了，9月份返回了学校。

## 七、我在清华分校

大概1968年春节过后，清华分校（建在四川绵阳青义镇的小山坳里）来了几位造反派工人，要求井冈山派人到分校“领导革命”。团派总部派我去，我也想到四川看一看，就欣然答应了。文革前，清华、北大开始建分校，北大的分校选在汉中。我第一次进川。火车上非常拥挤。在弯道处看到前后车厢，车厢外，车厢顶上都坐了不少四川老乡，他们冒险这样坐车外出或回家。到了清华分校，那时还只是一个未建好就停工的工地，对外称为“651工地”（意思是65年1号工地，北大的称为653工地）。工地上约六十几位职工，基本上是四川的年轻人，两位清华64年的毕业生分配在这里工作，当时就是管理职工，看好工地。由于二位老师被打成“保守派”，管不住这些职工，工地成了无政府状态。我去之后，以井冈山的名义，与职工中的造反派头头，成立一个“井冈山兵团651分团”。他们很听我的。我规定不准参与社会上的文革活动，要“抓革命、促生产”。管理工地具体该做哪些事，我听二位老师的意见。我责令回家不上班的职工回工地上班，否则停发工资。这样，就把职工组织了起来，作些能够做的事。后来我回到北京清华时见到了这二位老师，他们称赞我在那儿做得很好。这个工地在文革后变成了西南建材学院。

我在清华分校作了一件错误的事。那时，清华发生了武斗，“团派”派来一位同学（他原先在这里参与了绵阳的文化大革命，熟悉不少造反派）搞武器，要我出车配合。我派车同去了一次，但这次没搞到。在后来的“清查516”过程中我交待清了这事，大概是核查属实，也就没有事了。

## 八、武斗，工宣队进校与“红卫兵运动”的结束，毕业

清华的团派和414派在1968年终于爆发了两派武斗。全国此前已经有了广泛的武斗。例如我去的绵阳，两派武斗死了不少人，一派的人被赶出绵阳城到山上“打游击”；陕南的安康及平利县武斗，我大姐家被烧。全国武斗，尤其是北京高校武斗，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已经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毛泽东原先没想到的吧？这种情况下，向北京各高校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工宣队进清华时，受到了当时武斗占上风的“团派”，即蒯大富这一派的抵制，据说打死打伤工宣队人员多名（从武斗到工宣队进校，因我不在学校，具体情况不了解）。这时，毛主席又一次接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但这一次不是表扬而是批评、警告（当然，毛主席不会说自己有责任）。武斗最终消除了。学生归到各班在工宣队领导下活动。这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也就完全结束了，学生们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

约1968年8、9月份，当时我在家接到同学来信，告知工宣队进了校，将要毕业分配，我就回校了。回校后看到“井冈山”的主要头头几十个由工宣队统一办“学习班”，我班有二、三名同学在其内。各系，各班都由工宣队管理。我班同学重新欢聚一堂。文革以来我班是全校、或是在全国对立最突出的班，同学之间形成严峻的两派。两年多过去了，两派同学们似乎明白了，都是受害者，所以全班同学友好热情。这时，大家一致推举我当了班长。

这时候的政治气氛是全国人民歌颂毛主席，宗教式的狂热。工宣队带头跳“忠字舞”，我班

也全体学会了。工宣队带学生并不上课，只是每天学“毛选”，熟背“老三篇”。新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更精致，林彪写的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这么长的一段话谱成了曲，大家一齐合唱。

工宣队进校后领导全校，工人中普遍称“师傅”，所以对工宣队中每一个人都称“师傅”。这一称呼一直流传到社会，时兴了好多年。

临毕业前的一件大事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那天通知说有重要新闻组织全体学生听广播。广播的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公报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听了广播之后每个人都沉默不语。在这前一年，我还积极参与了“打倒刘少奇”的运动，但是，运动发展到这种状态时，心中对文化大革命也产生了怀疑。现在看来，这次全会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大会，对刘少奇作了完全错误的处置。用党的大会来撤销国家主席，也是破坏宪法、以党代政的极端做法。

1968年12月份，在我们将毕业分配时，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这样，城市里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到农村“插队落户”。这实际上是为了疏散城市里那么多停课闹革命的学生，以收拾局面。文革十年，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造就了一代新的文盲和半文盲，形成了科技人员的十年断代。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之一。

我们当时还是由国家统一分配，贯彻的是绝对服从分配，党叫到哪就到哪。我班的分配情况是：包括我，七人分配到核工业部的企业，我分配到核工业部甘肃七九二矿，但是先到沈阳兴隆店部队农场劳动。蒯大富分配到宁夏青铜峡一座冶炼厂。还有部分同学是分到甘肃、河南各省再二次分配。

要分别了！同窗六年风风雨雨，留下了无尽的感情，全班同学在二校门毛主席塑像前合影留念。我因为是元月10号到农场报道，这十多天的日子又回不了家，所以就在学校送走了每一个同学，才踏上去东北的列车。

## 九、化902班同学毕业后的概况

我班同学到工作岗位后，基本上都担任重要技术工作。现在大多数都退休了。这里特别记下蒯大富。他毕业后分配到宁夏青铜峡304厂。不久，开始清查“516”，被抓到北京清查。后安排在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毛主席去世后，逮捕了“四人帮”，蒯大富、聂元梓、王大宾、谭厚兰、韩爱晶也被捕。在审判“四人帮”的电视记录片中我看到了蒯大富。蒯大富被判17年徒刑。他并不承认自己有罪。我同意他的观点。一次，我到清华参加一个学术会，见了大学班主任曾宪舜老师，提到了蒯大富。我说：“蒯大富有什么罪？”曾老师说：“总得有个代表人物吧。”据说，胡耀邦主张不追究学生。但是，邓小平、王光美要追究。1993年校庆，是我毕业后第一次见到蒯大富。那时他已出狱几年，妻子是北大毕业生，已有了一个三岁的女儿。那时，北京的一家公司聘他当总工程师，但是，北京市委不允许他在北京，据说是王光美发了话。他去了常州工作，常州市委又赶他走。宪法规定了居住自由，就算蒯大富犯了罪，但是已服刑17年，恢复了公民权，不该再受限制。后来他只好去了深圳，改名“戴明”，与人合伙做生意。日久真名也就公开了，他自己办了公司搞音响工程。在深圳，他的生意还不错，业务接到北京等全国各地，已有一定财富。这也是他能力的体现吧。（2010—8—7补充：去年我来到深圳一家公司打工，又和蒯大富见了面。他已经不做公司了，几经周折得到了每月三千元养老金过日子，女儿蒯小琼在北京传媒大学读书。）

2004年12月于江苏江阴初稿，2005年12月于河南许昌续改

2 0 1 0 年 8 月于深圳修改

□ 原载《记忆》第 5 9 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